

著名历史学家熊月之：香山出买办,亦出志士

本报记者 张元章

“香山出买办，亦出志士。”著名历史学家、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所所长熊月之在接受本报文化周刊记者时说，珠海两位杰出的革命烈士苏兆征、杨匏安都才华出众，也都英年早逝，共同安息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令人扼腕叹息。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和活动家，他们为崇高理想而奋斗，是富有理想的革命家，大义凛然，名垂青史。

苏兆征利用上海租界进行秘密活动

苏兆征出生在广东，最初工作在香港，参加革命以后的主要活动地点是香港与广州。他与上海发生关系，是因为 1927 年“八七会议”以后，他当选为临时政治局委员，并担任政治局常务委员，成为中共中央的领导成员。

“八七会议”是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主题是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批判陈独秀等人的右倾路线，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会议以后，中共中央机关从武汉迁往上海。迁移的原因，根据李维汉的回忆是，中央认为当时的武汉已经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而“上海的革命力量比武汉强，同时也比较容易隐蔽”。事实上，那时的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居民来自全国各地，五方杂处，流动量大，交通便利，空余房屋也多，有利于中共中央机关的秘密活动。大概在 1927 年 10 月上旬，中央机关陆续抵达上海，苏兆征应该就是那时来到上海的。

苏兆征到上海以后，住处与生活情况怎么样呢？熊月之告诉记者，据李维汉回忆，党的机关迁到上海后，中央机关一般设在苏州河以南公共租界沪中区一带，江苏省委机关多设在闸北、虹口一带，团中央机关则设立在法租界，这样分散开来，容易隐蔽，比较安全。当时有一条原则，即机关社会化，党的各级机关都以商店、住家、医院、写字间的名义出现，与国际接头的机关是古董店，外国人来往不易被发现。中央多数领导同志住在公共租界的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一带，少数同志住在法租界与公共租界交界处，苏兆征所住的地方就是后者，具体地段是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淡水路附近。瞿秋白、李维汉等人也住在这一带。住在这里，是为了利用租界当局与国民党方面的矛盾以掩护秘密工作。就是在这里，苏兆征参加了中央的领导工作，具体负责中央财务小组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1928 年 2 月，他在这里先后主持召开了太平洋劳动会议秘书处第二次会议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一次扩大会议。也是在这里，他走完了生命的最后历程。

“苏兆征是中共早期杰出的工运领袖，富有组织才干和献身精神，与刘少奇、李立三齐名，与邓中夏、邓小平稔熟，倘天假以年，必能为中国革命作出更大贡献。”熊月之说。

杨匏安更像瞿秋白

对于杨匏安的一生，熊月之将之和瞿秋白相比较。“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家中，在努力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杨匏安有点像李大钊，所以学术界曾有‘南杨北李’之说。而在家庭背景、个人禀赋、一生遭遇方面，他更像瞿秋白。”

杨匏安和瞿秋白两人都出身在破落的富庶家庭里，天纵英才，能文善诗，在学术上都有一定的造诣，连最后牺牲的方式、年龄也差不多，都是在拒绝敌人的一再劝降以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牺牲时都只有三十五六岁，瞿 36 岁，杨 35 岁。所不同的是，瞿秋白去世以前，写了《多余的话》，引起身后多年的波澜；杨写了《死前一夕作示狱友》：“慷慨登车去，相期一节全。残生无可恋，大敌正当前。知止穷张俭，迟行笑褚渊。从兹分手别，对视莫潸然。”表现出威武不屈的崇高气节。

杨匏安与瞿秋白在党内的地位都曾经大起大落，1927 年的八七会议以后都有了变化，不同的是，瞿的地位上升，主持中央工作，杨的地位下降，被取消了中央监察委员的资格，受到了留党察看的处分。杨在长期从事革命活动过程中，似乎受过更多的磨难。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他一家十多口人，自己患肺病，妻子体弱，七个儿女有两个因病缺医而早夭。他白天为党工作，晚上写稿译书外，还要帮家人推磨做米糍，让老母和孩子上街叫卖。他在 1925 年、1929 年与 1931 年三入牢狱，受尽折磨。

“杨匏安与瞿秋白都是极有才气的知识分子，都是富有理想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是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活动家，都是年轻的革命烈士。他们的文集，都已经被争利出版。他们的故乡人民，也都在以不同的方式，纪念他们。他们都已不朽！”熊月之说。